

奥斯维辛,两个创伤民族的悲情碰撞

汪舒明

塑造和表现怎样的民族历史叙事和集体记忆,其实也是地区国际政治的映像。曾经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日渐遥远模糊,而欧洲许多地区却正经受着“历史的报复”。充满悲情的受害者记忆或自我颂扬的民族英雄主义记忆在欧洲许多国家和民族沉渣泛起,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相互助推。

在西方记忆政治中,纳粹大屠杀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转折性事件,“奥斯维辛”则是这一事件的中心象征,是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圣地”。它象征着纳粹主义的邪恶暴虐以及犹太民族在欧洲遭受种族灭绝的悲惨命运,也象征着西方基督教世界悠久反犹太主义的悲剧性结局。

纳粹大屠杀已经过去70多年,但在波兰这个大屠杀主要发生地和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所在地,塑造和展现这一事件记忆的斗争仍然激烈。关于波兰在大屠杀历史进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论辩,一再在波兰公众舆论中掀起惊涛骇浪。近期波兰实施的一项关于反对历史“污名化”的法律修正案,凸显

出欧洲在记忆政治问题上的深刻裂痕。

捍卫波兰“历史名声”的战争

2018年1月26日,波兰众议院通过了关于“国家记忆研究所法”的修正案,此后,该修正案在参议院通过并经波兰总统签署。2018年3月,波兰参议院还通过法案,将3月24日设为特殊纪念日,纪念二战期间波兰人救助犹太人的义举。“国家记忆研究所法”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旨在禁止使用“波兰集中营”等说法、禁止暗示波兰直接或间接参与屠杀犹太人,

违者可处以最高三年监禁。反对将集中营冠以“波兰”字样,这并不是主要争议所在。犹太组织也大多同意和理解波兰对自身形象因集中营名称而误解的担忧。但修正案还规定反对“公开并违背事实”指责波兰民众或政府,“应对纳粹罪责或其他罪行负有或分担责任”等提法,被外界抨击为将对相关问题研究和探讨构成新障碍。

该修正案迅速引发了以色列和各地犹太组织的强烈谴责。以色列政要纷纷谴责该修正案“毫无依据”、“改写历史”、“打压学术和言论自由”,表示“强烈谴责”、“不可接受”。以色列重要反对党“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甚至公开宣称“确实存

在波兰死亡营”、“波兰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是共犯”、“数十万犹太人未曾遇到德国人而被杀”。以色列国家大屠杀纪念机构“亚德·瓦谢姆”则声明称该修正案“模糊了关于波兰人在大屠杀期间协助德国纳粹的历史事实”。“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主任希尔拉比称该修正案是对波兰极端政治势力的“怯懦投降”,将使波兰“蒙羞”。“美国大屠杀纪念馆”还致信波兰总统,担心新修正案“可能逆转数十年来波兰在大屠杀教育、研究和记忆方面的……努力”。“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则将这一修正案视为波兰与犹太人关系的“关键时刻”。

犹太世界的猛烈批评激起波兰舆论的强烈反应。面对国

际舆论压力,波兰总统在签署修正案时称,“保护波兰和波兰人民的好名声很重要”,“我们有权拥有我们的历史真相”。在一次记者会上,波兰总理火上浇油地称“也有犹太人与纳粹勾结”。波兰媒体中的反犹情绪明显上升。有波兰电视频道称,犹太人对该修正案的反对,部分来自获取波兰资产的动机。还有电视台受邀嘉宾戏称“死亡营”可更名为“犹太死亡营”。更有波兰记者在媒体发文,称“我们正与犹太人作战”。曾任波兰总理的欧盟主席图斯克担忧,此种反犹言论将危及波兰在全球的形象,“关于华沙的负面舆论将形成一场海啸”。

(下转14版) ➔

◀ (上接12版)

式经常重复时,它们会渐渐地脱离意识的领域。不过如果重复的场合或环境条件与以前的不同,它又立即进入有意识的辖区。”(Schrödinger, Erwin. 2012. *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 of the Living Cell with Mind and Mat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95) 类比关乎生物体的生存,因为生物体要通过现在发生的事件与过去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类比将过去的相似经验应用于新的情境,指导认知活动。

类比生成:从孩童到天才

类比不是稀有的认知事件,它时刻发生,并且作为认知的核心,存在于各个层次——从简单的事物识别(recognition)到人类历史上的一些伟大发现。

没有人不制造类比,不过大多数类比显得非常平庸,寻

常、不足为奇。孩童的类比会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侯道仁举了一些例子,例如,2岁的卡米尔(Camille)说:“我脱了香蕉的衣服!”(I undressed the banana!);7岁的汤姆(Tom)说:“你的雪茄要化了!”(Your cigarette is melting!);成年人有时也会犯类似的修辞错误,例如,“有人告诉我说,我们的房子生于20世纪30年代”(I was told our house was born in the thirties.)。然而,制造足够好的、足够深刻的类比的确是一种非凡的、罕有的才能。亚里士多德称隐喻是“天才的标志”,因为能做出好的隐喻即意味着拥有一双能发现事物相似之处的慧眼(亚里士多德《诗学》,第22章)。侯道仁显然持有相似的见解。侯道仁认为,所谓智能或智力(intelligence)就是迅速地(甚至是无意识地)抓住情境之本质的能力,它是一种(迅速地)找到强大类比的能力。

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往往凭借类比。于是,“天才的标志”似乎是在两个相隔遥远的事物之间寻求深刻的联系,而这两个事物在常人看来可能风马牛不相及。西尔维娅·娜萨在《美丽心灵:纳什传》(A Beautiful Mind)中称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 Forbes Nash Jr.)拥有非

Surfaces, Essences, Analogies:

脑海的本质

侯道仁在设计讲座题目时巧妙地利用了中英文在字形与含义上的对应。将英文题目“Surfaces, Essences, Analogies”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组合为“SEA”,与中文题目“海”的含义相对应;同时,将字母“S、E、A”楷体化,并分别嵌入到汉字“海”“的”“本”的书写中(注意图片蓝色部分),在字形上进行对应;此外,“脑海的本质”的英文是“nature of mind”,于是标题就意味着“Analogy is the nature of mind”,这又呼应了其基本观点:“Analogy is the core of cognition”。

凡的“类比”天赋:“其他人通常会在山上寻找攀登顶峰的道路。纳什却干脆爬上另外一座山,再反过来从那个遥远的山峰用探照灯照射这座山。”在对科学发现的考察中,侯道仁指出,天才如爱因斯坦者,一方面依靠类比生活,另一方面依靠类比洞悉了“ $E = mc^2$ ”的秘密。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称:“无论我们谈及发现还是发明,类比不可避免地存在于人类思

想中。”(Oppenheimer, Robert. 1958. “Analogy in science.” *Centennial Review of Arts & Science* 2 (3): 351-373.)甚至,《表面与本质》这部著作的写作本身也依靠类比。侯道仁和桑德同时撰写《表面与本质》的两个版本,一版用英语写就,另一版则用法语写就,但两者又绝非彼此之间的一个简单对照翻译,而是在两个版本之间存在一种高层次的“跨文化类比”。

最后,侯道仁总结:认知=识别(Cognition = Recognition),而识别通过类比发生(Recognition takes place via analogy),因此,类比是认知的核心!(Analogy is the core of cognition!) 类比无处不在!(Analogy is everywhere!) 我们永远遨游在广阔无垠的类比之海当中。

侯道仁关于“类比是认知的核心”的观点很容易激发我们在他所谈的“类比”与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George Lakoff)所谈的“隐喻”之间建立起类比,也就是说“类比”与“隐喻”具有某个相似的本质成分——它们都是思想展开的心理机制。莱考夫在《女人、火与危险事物:作为心智本性的范畴》(G. Lakoff,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1987)写道:“范畴化研究是理性研究的一把钥匙。通过审视范畴化现象,我们发现理性是具身的(embodied)和富于想象的。理性之所以是具身的,是因为理性所基于的结构本身来自我们的身体经验。理性之所以是想象的,是因为理性运用了转喻、隐喻以及广泛的意象图式。”